

澳门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

陈希亮 (南京图书馆 馆 员)

This article recalls the activities of four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in Macao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and thus stresses the intimate links between Macao and the interior area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Macao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Key words: Macao modern times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近代史上四位仁人志士在澳门的活动,借以强调澳门与祖国内地密切的联系及澳门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澳门 近代 仁人志士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在澳门行将结束葡萄牙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之际,回顾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在澳门的活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澳门历史,尤其是澳门与祖国内地密切关系的认识,并借以纪念曾经在澳门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

一、林则徐与澳门禁烟和《澳门新闻纸》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是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派的主要代表和抵抗派的首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葡萄牙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香港、澳门为基地,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企图打开中国市场,攫取在华利益。鸦片泛滥将使中国“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林则徐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他于1839年3月到达广州后,即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气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1839年6月3日至25日著名的“虎门销烟”即是林则徐禁烟的一个重大成果。由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直同英国鸦片贩子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因此,林则徐十分注意澳门方面的情况,他了解到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表面上似乎恭顺守法,实际上居心叵测,而且与英美烟贩沆瀣一气,故而禁烟必须从澳门清源。因

此,他对澳门采取了突击性搜查。1839年5月,他命令中国官员带兵至澳门,按照编查保甲的办法,挨家挨户进行全面搜查,不许遗漏一户,主要是搜查葡萄牙人及外国商人的住处,看有没有私存鸦片。林则徐并要求这些外国商人签字画押,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澳门的葡萄牙“兵头”始而拒绝,继而以战争相威胁,林则徐大义凛然,针锋相对,表示中国政府的禁烟令必须无条件执行,没有丝毫通融余地,最终迫使葡方交出了一些英国商人藏匿在澳门的鸦片,并在澳门码头当众焚毁。1839年8月,林则徐又下令居住在澳门的57户英国商人全部驱逐出境,以断绝鸦片来源。1839年9月3日,林则徐偕两广总督邓廷桢亲自到澳门巡视检查禁烟事宜。他在澳门莲峰古庙接见葡萄牙“民政长官”,向他“宣布恩威,申明禁令”,告诫他们安分守法,不得囤积鸦片,不得包庇不法奸商,并对大三巴、关前街、妈阁庙、南湾等主要街道进行了重点巡视,还抽查了部分洋楼和民房。9月8日,林则徐再令广东海关监督豫坤视察澳门,按照他提出的“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一贯主张,重申严禁鸦片贸易,同时恢复澳门与内地的正当贸易。

林则徐在澳门和广东期间,为了使禁烟工作

有的放矢地进行,他一改满清官吏愚昧自大、盲目排外的陋习,非常注意搜集西方情报,了解和研究各国情况,吸收和借鉴各国先进技术。这种知己知彼、为我所用的做法,使他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早实践者,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澳门新闻纸》(抄本六册)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林则徐从1839年3月到广州起组织译员翻译澳门、广州等地的外文报刊,将《澳门纪事报》、《广州周报》等报刊中与中国有关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编译整理,再提供给有关方面参考。其内容有英美鸦片贩子行贿和满清官吏受贿的记载;有殖民主义者和鸦片贩子对禁烟采取的对策;有外报反对禁烟、鼓吹战争的言论;有关于各国对华政策和对华领土野心的记载;有关于西方各国史地和政治、经济等情况的资料。林则徐的译书活动对了解敌情、制定抗英策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近代中国思想界起了启蒙作用,开了近代西学传播之先河。

二、郑观应与《盛世危言》

郑观应是戊戌变法以前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郑观应出身在与澳门毗邻的广东省香山县,他的一生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1886年春至1891年4月的五年间,他基本上住在澳门过隐居生活,集中精力补充修改《易言》,辑成《盛世危言》。1893年5月1日其父郑文瑞在澳门病故,郑观应于5月22日赶回澳门为父奔丧,直至9月9日。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之父康达初逃往澳门避难,郑观应寄去现金予以接济。1903年3月郑观应奔走于澳门、香港与广州之间,从事其商业活动。1906年2月3日,郑观应在澳门为继母“守制”。1906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12月下旬,1907年4月1日,郑观应又三度回澳探亲、度岁和祭祖。1907年8月以后一年,郑观应在澳门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病逝,次年移葬于澳门前山。

郑观应在澳门的社会经历和见闻,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有着更深的了解,对他的思想发展,特别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无疑是具有很大影响的。1873年他写《救时揭要》,提出禁止鸦片、救灾恤贫、兴办工商的主张,这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要求。1875年写成的《易

言》,开始明确批评封建专制,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改革,要求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除了对君主专制进行更加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外,着重论述了开设议院的紧迫性。他认为:议院为国家富强之根本、根绝专制之良方、御侮救国之要政。《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力作,在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是这部政论文集的热情的读者,他在深夜的灯光下,瞒着他的父亲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三、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与《知新报》

康有为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则是维新运动主要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报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机关报刊。它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长沙的《湘报》一起成为当时改良派的四大报刊。《知新报》是在康有为的亲自领导下创办的。1896年11月,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抵澳门,经过紧张的筹备,1897年2月22日正式创办《知新报》。该报由戊戌变法的牺牲者,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康广仁和澳门著名士绅何穗田任经理,由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和何树龄任主笔。撰稿人还有梁启超、韩文举、吴恒炜、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等,康有为的两个女儿康同年和康同薇也参加了报务工作,康同年一度主管报务,康同薇则主要担任外报稿件的翻译。该报编务阵容强大,囊括了《强学报》编辑部的全部成员,还吸收不少维新派的知名文士,其中有些人一直是改良派报刊活动的骨干。这表明康有为对该报的极端重视。康有为一家四个人参与其事。他本人历次呈给光绪皇帝的《为胶事条陈摺》、《为条陈商务摺》、《请及时变法摺》等请求变法的奏折全文,以及介绍俄皇彼得大帝“变政”经过的文章都刊登在该报的显著位置,有的并附以精细的插图。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也参加了该报的筹备工作。1896年10月至12月,梁启超回广东探亲期间,曾专程到澳门和何穗田等研究过该报的出版事宜,虽然因《时务报》编务繁忙,他力辞《知新报》的

主笔,但帮忙草拟了章程,筹措了经费,并先后在本报上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知新报》在关于变法维新思想的宣传上,认为变法必须首先从废科举、设学校、育人才等方面着手,然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知新报》对有关变法新政的报道尤为注意,所言多为他报所不敢言者,它在告白中声称“本馆于京师及各省近事有耳闻见不容于言者甚多,拟抉择多载。”其所以选择在澳门出版,是因为考虑到澳门是葡萄牙的租借地,为清廷势力所不及,在这里出版,比在内地其他城市少受一些限制,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正因为如此,《知新报》是戊戌政变后幸存的很少几家维新派报纸之一,它直到1901年1月20日出至133册后才自动停刊。该报大部分发行于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国内大中城市,并传播至美国、日本等地,在维新派的舆论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爱国活动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离澳门只有咫尺之遥。澳门是孙中山青少年时期经常过往之地,是他首先步入社会谋生之地,也是他策动和指挥辛亥革命的活动基地之一,澳门同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1878年,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途经澳门,“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遂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从而开始了他探求真理的道路。1884年至1886年,1887年至1892年,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中央书院和西医书院,在此期间,“余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违。时闻而附和者,有陈少白、尤少纨(尤列)及杨鹤龄三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同志戚友交游,皆呼余等四人为四大寇。”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便到澳门行医救世。他说“余自己西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人世之媒。……及余毕业之后,悬壶(即行医)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是年9月,孙中山来到澳门镜湖医院行医,义务为病人看病。澳门是孙中山结束学业之后踏足社会人生旅程的第一站。孙中山到镜湖医院后加设西医门诊,免费诊治,由于医术高明,医德高操,顿时声名鹊起,在澳门妇孺皆知。这年年底,孙中山又在

澳门繁华的草堆街开设中西药局,一面为澳门民众行医赠药,一面作为革命活动的基地。1893年7月孙中山又和澳门的葡人费尔南德斯合作创办了中文《镜海丛报》,借报纸鼓吹革命,向民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开始筹设澳门支部,由香港方面领导,谢英伯任首任主盟人,负责人还有高剑父,主要成员有梁义、梁镜清、梁倚神等。为了便于活动开展,澳门支部开设了濠镜阅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半公开机关,宣传革命,组织群众。该报还通过向社会募款捐书,公开征求社员,团结了一大批觉醒分子,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多次到澳门。1913年,他在澳门海面的军舰上会见陈炯明,督促他宣布广东独立,并商讨了讨伐袁世凯的计划。从1914年到1916年,孙中山曾多次派朱执信到澳门组织发动讨袁运动,筹集经费,购买军火,印刷传单等。1919年,孙中山派孙科以特派员身份到澳门,成立办事处,联络各方代表,策划反对北洋军阀的起义。孙中山与澳门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他本人在澳门进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动,而且他的哥哥孙眉和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等许多亲属都长期生活在澳门,因此可以说澳门是他的第二故乡。

林则徐、郑观应、康有为和孙中山,这四位生活在不同时期的近代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他们都在澳门留下了值得纪念的足迹,这些都赋予了澳门与祖国内地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特殊关系。

从四人所处的时间看,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洋务运动时期的郑观应,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它表明,澳门在整个中国近代时期都与祖国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四人活动的内容看,林则徐的禁烟和书报编译,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清朝统治者提出了经济上和政治上变革的要求;康有为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鼓吹思想解放,在客观上加速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灭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其目的即是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上述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有识之士的不断成熟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它预示着,澳门的葡萄牙殖民统治也将伴随历史前进的脚步而终结。